

趙時春 文集校箋

杜志强 整理

西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隴右文獻叢書

郝潤華 主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趙時春文集校箋

杜志强 整理

西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隴右文獻叢書

郝潤華 主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趙時春文集校箋 / 杜志强整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12

(西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隴右文獻叢書/郝潤華主編)

ISBN 978-7-80696-952-6

I. ①趙… II. ①杜… III. ①趙時春—文集 IV. ①Z4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243860號

趙時春文集校箋

杜志强/整理

出版人/劉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號 郵編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張19.375 字數45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52-6

定價: 52.00元

引 言

趙時春（1508—1567），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今甘肅平涼市）人，嘉靖五年進士，“嘉靖八才子”之一，歷官刑部主事、山東民兵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都督雁門等地軍務，著作有《平涼府誌》十三卷，《趙浚谷集》十六卷，《洗心亭詩餘》一卷，《稽古緒論》二卷。在明代嘉靖年間的政壇和文壇上，趙時春是一位較有影響的人物，在隴右文化的發展歷程中，他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過，就人們對他的評價而言，當時就已經頗有毀譽。今天，從研究明代文學、弘揚隴右文化的實際出發，有必要對趙時春的著作進行系統的整理，對其詩文著述進行深入的研究，評價他在明代文學和隴右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他人生的是非功過。

一、趙時春的研究現狀

（一）研究現狀

趙時春的研究現狀是比較冷落的。在明代，徐階、王崇古、李開先、胡松、周鑒、孫應鼐、李贄等人先後爲他作文集序言、墓誌銘、行狀、傳記，保留了較爲豐富的原始資料。之後，《明史》、甘肅地方誌爲他立傳，除此之外，追記、研討他的資料就很少了。一些大型詩文選本如《皇明經世文編》《明文海》《御選明詩》《明詩綜》《歷代賦匯》等選入了他的詩文，王士禎《池北

偶談》卷十一亦有贊譽其《平涼府誌》的話。書目方面，《明史·藝文誌》著錄其《浚谷集》《平涼府誌》，《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並有提要，《千頃堂書目》亦著錄。民國期間，張維《隴右著作錄》《隴右方誌錄》對趙時春的著作進行了梳理、載錄。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學人對趙時春的關注，除此之外，似沒有比這更深入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隴右文化研究的深入，趙時春得到了學界的關注和研究，出現了一些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第一部趙時春傳記^[1]，第一次整理印行的趙時春詩歌作品^[2]，第一次整理的趙時春方誌著作^[3]；另外，企予、壬木、王學禮、李春茂、荊愛民等人發表了專門討論趙時春的文章。總體看，這些文章討論了趙時春生平或文學的一些側面，與前引三部著作一起，推進、深化了趙時春研究；但是，僅有這些成果，也說明趙時春研究是冷落的，繼續拓展的餘地還很大，主要表現在：

研究視角的局限。以上研究者大多居住於平涼，他們熟悉平涼史地，有過實地考察，這使得他們對趙時春與平涼關係的研究最具深度和特色，但是，其成果很少能從明代社會、政局、文學乃至時代的高度來探討、評價，因而就顯得視野不夠廣闊；一句話，對趙時春的橫向考察不夠。

研究資料的局限。由於平涼圖籍資料的限制，使得這些研究的資料主要局限在《平涼府誌》和《趙浚谷集》上，有些文章甚至說《趙浚谷集》不易找到，《平涼府誌》原刻本不存，說趙時春是狀元（其實是會元），甚至說徐階的資料難找，這些都顯然有違事實，也體現出研究者在材料上的局限。退一步講，與其說這是研究者的局限，還不如說是平涼地域的局限，平涼偏處一隅，圖籍欠豐，因而嚴重限制了他們的學術研究，這不能不說是

一大缺憾。

（二）以往對趙時春的評價

以往對趙時春的評價大致有褒貶兩方面。褒的方面，主要集中在其直言敢諫、敏銳的才思、豪爽的個性、俊朗的文筆和勇敢殺敵的精神等。這在徐階《趙浚公墓誌銘》中體現得最為集中，其他如胡松、李開先、周鑒等人為其文集作的《序》中也有較多表述，胡松“秦人而為秦聲”^[4]的評價可謂慧眼識見。儘管這些序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褒美的成分，但其肯定的基調是明顯的。比較公允的評語是《四庫提要》：“今觀其詩文，多慷慨自喜，不可拘以格律。胡松《序》所謂‘秦人而為秦聲’，亦其風氣然也。然則史所謂‘文章豪肆’者，長短俱在是矣。”《提要》的評語是辯證的、合理的。

貶的方面主要集中在趙時春的談兵和帶兵打仗上。趙時春喜談兵，被超擢為山西巡撫，卻一戰而敗，因而被罷官，在當時引起了較大非議。徐階《趙浚公墓誌銘》中的話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予以為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為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5]徐階的意思是，他身為好友、位居宰輔而不薦舉趙時春，主要是看到關於趙時春的反面議論還沒有消除，希望等論定之後再薦舉。徐階所言“未有定評”的背後正是趙時春兵敗之後的輿論譁然。《明史》本傳稱“時春喜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寇不擊，為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躬搏寇者，時春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其中“天下皆壯其氣”似是褒揚，但“一戰而敗”卻深耐尋味，其實隱寓着對趙時春戰敗的看法。儘管《明史》沒有明確說趙時春兵敗後輿論譁

然，但揆諸情境，他在當時頗有毀譽是必然的。

正是由於這樣的毀譽未定，所以，對趙時春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就顯得更有意義。

二、趙時春生平

“浚谷”是平涼城東南隅水名，是趙氏自祖上以來世代居住的地方；趙氏元末自南京遷到平涼，趙時春父、祖均為明朝下層官吏，他們的長期任官為趙氏在當地積累了較好的家聲，也為趙時春的早年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趙時春自幼聰穎，隨父親到霑化教諭任所遊學，十四歲回鄉中陝西鄉試第三名，受到了陝西提學副使唐龍的大力贊譽。十八歲，中嘉靖五年禮部會試第一，並以此博得高名，被選為庶吉士，“館閣諸公深以國士器之”^[6]，次年被任命為刑部河南司主事。

嘉靖八年，趙時春被調任兵部武庫司主事。趙時春喜歡談兵，出任兵部職務後贏得了“知兵”的名聲。由於嘉靖皇帝喜好祥瑞，所以禮部於嘉靖九年奏賀祥瑞，羣臣也隨之紛紛上獻瑞兆，弄得朝野祥瑞紛呈。趙時春性格耿直，不忍見此欺上罔下的局面，於是他激切上書嘉靖皇帝，要求停止獻瑞，並懲治那些靠獻瑞邀賞的佞臣。嘉靖皇帝讀完奏章，當面指責趙時春妄言，趙時春無言以對，但內心不服，隨後又上奏指陳政事，認為“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7]。此表激怒了嘉靖皇帝，將趙時春下獄治罪，削職為民。這是趙時春初次罷官，距他出仕僅四年多，等待他的是近十年的家居歲月。

嘉靖十八年，受許讚的推薦，趙時春與霍韜、徐階、任瀚等十二人同時被起用為東官屬官，趙時春任翰林院編修、司經局校書。這次用人，受到了朝臣的肯定，趙時春本人也以為大展宏圖

的機會即將到來，但遺憾的是，他激切直言的性格再次招來了大禍。次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重、久不臨朝，趙時春、羅洪憲、唐順之三人上書，請求皇太子在次年正旦日臨朝，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見，“以崇國本”。嘉靖皇帝為此大為惱火，恰好有方士妖言，“倡兩龍不見之說”^[8]，這更激起了嘉靖皇帝的怒火，準備治三人之罪，但由於三人的儒學在當時負有盛名，於是就削職為民。這是趙時春第二次被罷官，此次任職，不到兩年時間，等待他的又是十年的家居歲月。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擾邊，兵鋒直至安定門，京師紛擾。時任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的徐階力薦起用趙時春禦戎，遂招趙時春任兵部管營主事，至京後任兵部職方司主事。然而，歷經兩次宦海沉浮的趙時春，其激切直言的性格依然不改。當時，平虜大將軍仇鸞握有重兵，但仇鸞主和，主張與俺答互市馬匹。此論一出，朝野議論紛紛，趙時春更是激烈發難，說：“此亡宋秦檜策也！焉有官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僧開市乎？”^[9]而且還作《責言》，深詆市馬誤國之罪。這引起了仇鸞的極大不滿，屢次羅織罪名陷害，但由於仇鸞與嚴嵩的關係轉惡，嘉靖皇帝對仇鸞的消極抵抗也有所察覺，所以，仇鸞不久悲懼而死，趙時春逃過一劫。這期間，趙時春曾被仇鸞外放為山東德州民兵僉事，訓練民兵，數次入衛京師，因此陞山東兵備副使。

仇鸞死後，趙時春由於訓練民兵有方，於嘉靖三十二年二月被超擢為山西巡撫、提督雁門三關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是明代要職，處於抵禦俺答的前綫，趙時春在都督雁門等地軍務的同時，還帶有都察院職銜，這說明當時他是全權負責山西周邊抵抗俺答的任務。從山東兵備副使超擢為方面大員，其背景當不僅是趙時春“知兵”，而且與徐階的大力引援有關。趙時

春躊躇滿志，在前綫多有吟詠，但是，他的戰績顯然辜負了徐階的薦舉。此年八月，俺答犯代州，趙時春不顧總兵李淶勸阻，親率軍隊與俺答作戰，頗有斬獲，但率軍輕進，在大蟲嶺附近遭遇埋伏，李淶及其全軍戰死，趙時春僅以身免，被守軍“縋之上，乃得免”^{〔10〕}。戰後，趙時春個人斬獲有功，但李淶及其軍隊的覆沒，他難辭其咎，因此，被許功罪相抵，以原職回原籍聽調。趙時春此次任職不到四年時間，加上前兩次任職，總共不超過十年。此後，家居歲月一直伴隨着他。

關於李淶戰死，趙時春的門生、女婿周鑒稱“總兵李淶自戰敗亡”，這顯然是回護之辭，作為都督雁門三關軍務的趙時春，顯然負有約束、管理、調遣總兵的職責和權力，說李淶戰亡是“自戰敗亡”，有失公允。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由於家族矛盾，趙時春移家到華亭縣硯峽鄉，其詩云：“移家硯峽千層嶺，淚灑丘園三百年。”^{〔11〕}詞云：“朋好苦相留，可是無情忘故丘？念吾廬破碎，有國難投。為皇家力戰三關，與宗室何心一鬥？”^{〔12〕}可見，當時趙氏家族矛盾頗為激烈，已經五十六歲的趙時春不得已而舉家離開故園，到數百里之外的羣山之中安家，因此，他心情沉痛。三年後，病逝於硯峽。

三、趙時春仕途分析

趙時春三起三落，登第四十年，其間任職勉強十年，賦閑於家三十年。表面上看，從陝西鄉試中的脫穎而出，到會試的會元、殿試的二甲第三，優異的科舉成績為其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後入翰林院，任職於兵部，這也是仕途的優良資源。還有靈寶許氏的提攜，有閣臣徐階的關顧，加上早年“三翰林”、“嘉

靖八才子”的輿論評價，以及他“知兵”的聲望，可以說，趙時春具備了明代官場陞遷的許多條件。然而，現實畢竟不是這樣，他被責過、杖過、罷官過，離開京城後還輿論譁然。個中情境，實耐尋味，現畧陳管見於下。

（一）趙時春仕途與權臣幫派之爭

趙時春考中會元後，面臨着一個無法回避的政治現實，即大禮議之爭。當時，處於大禮之爭兩端的楊廷和與張璁展開了殊死鬥爭，趙時春作為一個剛剛考中的進士、庶吉士，按理來說似沒有資格捲入其中，可嘉靖五年、八年兩榜進士卻均未能幸免。張璁作為大禮新貴，從進士到入閣僅六年時間，被嘉靖五年榜進士看不起，蔑稱之“白雲宗閣老”，而嘉靖五年會試主考官賈泳正是張璁大禮議的死對頭之一，這使張璁對該榜進士深為反感，於是建議嘉靖皇帝“俱遣出外授官，無一留為史官者”，“內趙時春為是科會元，年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13]，《明史·趙時春傳》也說他“以張璁言改官”，即趙時春被下放到刑部，原因就在張璁。嘉靖八年進士是張璁、霍韜主考，但這些進士祇感恩霍韜，並不感恩張璁，故張璁亦將之外放到部寺、州縣，其中即使有人被選為庶吉士，也難進翰林院讀書，所以沈德符有“吉士不讀書”之議，趙時春好友、嘉靖八年狀元羅洪先、會元唐順之也難能幸免。與趙時春一起並稱的“嘉靖八才子”均為嘉靖五年、八年進士，他們被動地受到了閣臣幫派的影響。

趙時春第二次任官，正是夏言主閣時期。當時霍韜、夏言相互攻訐，報復相尋，而趙時春與霍韜則關係密切。霍韜作為嘉靖八年會試主考官，與唐順之、羅洪先、李開先等人之間是門生關係；趙時春與唐、羅等人交往密切，同任官僚，恰好此時霍韜掌管詹事府，是他們的領導，因而他們與霍韜關係密切。由此可以

推理，夏言因厭惡霍輜而連帶及趙、唐、羅自在情理之中。今存趙時春詩《唁夏閣老》，作於夏言去世後，詩中將夏言比為李邦彥、秦檜，認為夏言是亂政之階，這與李開先詩《門聞夏桂洲凶報》詩對夏言的痛恨是一致的。這是趙時春再次遇到的朝臣幫派之爭，不久，霍輜病故，趙、唐、羅等人星散，各自返鄉。

趙時春第三次任職，也遇到幫派之爭，主要是嚴嵩、仇鸞與徐階之爭，其間因與仇鸞的矛盾而險被處死。趙時春受知於徐階，已見前述，不贅。

（二）趙時春仕途坎坷的主要根源

趙時春缺乏封建官場上的耐受力和應變力，這是他仕途坎坷的主要根源。如果說趙時春的初次罷官是由於年輕、對封建官場體察不深的話，那麼，第二次上書則完全是理想主義的行動。嘉靖皇帝生病，不理朝政，於是，“三翰林”上書請太子臨朝，恰好此時方士倡導“兩龍不見”，嘉靖皇帝因此對三人的上書十分反感，遂將其罷職為民。可以推理，皇帝久不聽政，百官肯定着急，也許會有讓太子監國的傳言，但畢竟没人敢上書。可是，“三翰林”卻上書了，為什麼？這還得從嘉靖十八年起用官僚說起。《明史》卷七十三《職官誌二》“詹事府”下載：“嘉靖十八年，以陸深為詹事，崔銑為少詹事，王教、羅洪先、華察等為諭德、贊善、洗馬，皇甫汴、唐順之等為司直、司諫，皆天下名儒，自明初宋濂諸人後，官僚莫盛於此。”可見，羅洪先、唐順之等“天下名儒”頗有時望，他們“深念天下之重”^[14]，認為應該為國事挺身而出，所以有上書的打算。趙時春與唐、羅為莫逆之交，因此，唐、羅又拉上了趙時春。現在看來，三人理想主義情結都很重，而同時起用也給了他們共濟時艱的勇氣，所以才有了這次看似十分冒失的上書。相比之下，與他們同任官僚的徐階

卻思慮深沉，他對封建官場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所以他最終位極人臣，而“三翰林”則明顯不及。

（三）趙時春缺乏前綫作戰的經驗

趙時春畢竟是一介文士，雖然部分作品中反映出他似乎習武，如《南巖集射》就是描寫他率領弟子練習射術的詩歌，但這改變不了他文士的本色。當然，文士並非就不能帶兵打仗；事實上，明代邊帥絕大多數都是進士出身。趙時春出身邊郡，喜談兵，任職兵部，這都是他與軍事結緣的契機。在任山東民兵僉事期間，他訓練民兵，率軍入衛，軍容整齊，受到仇鸞的嫉羨和刁難，也說明趙時春治軍有方。正因此，徐階才將其破格薦舉為山西巡撫，都督雁門等地軍事。督軍事僅半年，他探知有敵情，急於殺敵，不聽有着長期前綫經驗的山西總兵李淶的勸阻，冒險出擊，結果在大蟲嶺遭遇伏擊，李淶掩護戰死，趙時春被免官。現在來看，趙時春在都督雁門軍事之前，沒有一次實戰經驗，當他從德州調往塞外、作戰環境有了絕大改變時，那些通過訓練民兵積累起來的經驗不足以應付更為複雜的作戰需要，而且在軍情尚未覈實的情況下，親自率軍出擊，以至於“一戰而敗”。相比之下，王崇古在任宣大總督期間收買間諜以刺探軍情，而趙時春之敗，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一句話，他前綫作戰經驗太少。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一介文士，《明史》中卻當作邊將來立傳。與他同傳的還有姚鏌、張嶺、伍文定、蔡天祐、詹榮、劉天和、楊守禮、張嶽、郭宗皋，他們或為邊將，或為平定安南、宸濠之亂的將領。由此推理，趙時春在當時影響很大，除了他那封疆大吏的身份外，一個重要原因可能還是他的作戰及戰敗。對此，《明史》採取了肯定的主調，但還是委婉地用了“一戰而敗”的字眼。應該說這是客觀、公允的評價。不管當時將領多麼怯

儒，不管趙時春殺敵多麼英勇且有斬獲，也不管這種勇敢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勵其他將領，但損失畢竟是嚴重的，李淶之戰亡，趙時春負有直接責任，所以，他應該為失敗負責。

趙時春以文士任邊帥，在人生達到輝煌的同時，卻也走到了仕途的終點。是與非、成與敗、榮與辱，這些他曾經熱心討論的話題，還是糾纏在他的生前身後。畢竟，他祇是一介書生。

四、趙時春的性格與人格

平涼古屬秦地，秦民的慷慨好戰由來已久。趙時春生於斯、長於斯，濡染着秦風，因而他性格中的秦人烙印很明顯。《明史》本傳載他“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伉儷自喜，類其為人”，史臣也評論他“將畧自命”，點明了他慷慨主戰的個性。而嘉靖年間深重的邊患恰好為這種性格提供了騁展的舞臺，再加上他會元的榮譽、翰林的頭銜，使他在戰敗前成了文武兼擅的人才。可以說，慷慨主戰成了趙時春性格中十分突出的部分。當然，在認識深處，他並不一味主戰，他也渴望和平，如“每思循吏濟黎庶，無奈徵兵相繼摧”^[15]、“會看和氣充寰宇，銷散兵甲樂太平”^[16]等，表達出銷甲息兵的願望，但這都是建立在主戰的基礎上的。

趙時春性格的另一方面是正直、嫉惡如讎，這與其慷慨主戰相輔相成。本來，明代的官場給那些直言敢諫的官員以很高的贊譽，尤其那些因進諫而被貶或下獄的人。《明史》中對於那些犯顏直諫的奏章往往全文收錄，這也是史臣對諫臣的間接表揚。《明史·趙時春傳》主要記敘了趙時春直諫和征戰兩件大事，也說明趙時春的直諫在當時是有名的，那份讓他初次罷官的《崇治本疏》，還成了當時傳抄的文章。徐階《趙浚谷墓誌銘》云：“公

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渠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這是很生動的描述，可以看出，不管是什麼場合、什麼人，他都敢“引繩按渠詰責”。

典型的是他對仇鸞的批評和對方獻夫的態度。對仇鸞的批評見前，不贅，這裏介紹一下他對方獻夫的態度。方獻夫與霍韜同鄉，同爲大禮新貴，嘉靖十一至十二年間輔政。霍韜《渭厓文集》卷六有《題趙景仁卷後》一文，耐人尋味：

趙子時春守部官，予時寓詹事府，嘗來府共敘語，予薦之方西樵，西樵曰：“願一見之。”趙子不肯往。西樵曰：“所云趙子者，曰來見，久不見，何也？”予促之，趙子曰：“唯。”又不見。西樵曰：“所云趙子者，固欲見之，不見，何也？”予又促之，立遣導，且曰：“西樵先生欲見子，蓋脫畧於今之調韻者也，幸無是拘。”趙子唯唯，辭出府門，竟不往見。西樵欲見趙子，趙子不肯往見，皆非人所知也。未幾，予以憂歸，趙子以言去，不通問者六年矣。

從文章內容可知，霍韜在詹事府，根據張廷玉《明史·霍韜傳》，時間應在嘉靖九年，他職任詹事；方西樵即方獻夫，時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而趙時春則任兵部武庫司主事。霍韜將趙時春推薦給方獻夫，方獻夫確實想見趙時春，曾三次詢問霍韜，可是趙時春卻推辭再三，終究沒有去。顯然，趙時春有所顧忌，或者對方獻夫有看法，所以才沒有去。當時的情形是，嘉靖皇帝不斷給方、霍二人加官，二人鑒於輿論，都固辭不敢接受，趙時春在這個輿論的關鍵點上如果傾向於方獻夫，那可以肯定，他的仕途馬上就會改觀，但他的輿論評價也肯定會走向負面（今天史

學界對張璁、方獻夫等人的評價有所改變，但古代的輿論對他們一直是批評的⁽¹⁷⁾。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趙時春不為私利而改變自己的價值準則，他是一個正直的士大夫。

我們再從交遊的角度來看趙時春的個性、人格以及他在當時的影響。現據趙時春詩文概述其交遊如下：

趙時春交遊廣泛，主體是明代嘉靖年間比較正直的進士羣體，尤以嘉靖五年榜前後為多。明代吏制“率重甲科而輕鄉舉”⁽¹⁸⁾，進士是明代官場上勢力最大的一個羣體，基本上代表了進步階層。趙時春與之交往的士大夫絕大部分是進士，其中最密切的是“三翰林”。“三翰林”中除趙時春外，其他兩人羅洪先、唐順之均為嘉靖八年進士。另外還有“嘉靖八才子”，其中除趙時春、王慎中外，其他六人李開先、唐順之、陳束、熊過、任瀚、呂高均為嘉靖八年進士。為趙集作序的胡松，嘉靖八年進士；在趙時春仕途發展中有關鍵影響的徐階，嘉靖二年進士。他們應當是趙時春交往密切的羣體，或為學人，或為閣臣，或為憲使，都代表正直、主戰的一方，尤其是徐階，參倒嚴嵩，贏得了很高聲譽。這樣的交遊羣體，完全可以折射出趙時春的正直人格。

趙時春交遊者多為兵部官員，尤其以三邊總督、宣大總督、兵部尚書、兵部侍郎、陝西巡撫等為典型。這些朝廷大僚都屬於進士羣體，趙時春之所以與之交往較多，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在兵部任職，以談兵聞名，相見場合也多是在大僚們路過平涼時，而不是趙時春的刻意奉迎。這些人中，如姚鏌、翟鑾、唐龍、楊守禮、劉天和、柯相、賈應春、王邦瑞、詹榮、翁萬達、蘇佑、楊博、崔銑、楊守謙、王崇古（以他們中進士時間的先後排列）等，或為三邊總督，或官至兵部侍郎、兵部尚書，趙時春都留下

了與之唱和的詩篇。除了唐龍父子成爲嚴嵩黨徒外，其他大都立有較顯著的戰功，典型如劉天和、崔銑、王崇古；有的因嚴嵩的打擊而罷官，如翁萬達；楊守謙甚至被誣處死。而趙時春之所以與唐龍父子關係密切，是因爲唐龍於趙時春有知遇之恩，唐龍在主持陝西鄉試中大力提拔趙時春，使他脫穎而出，因而趙時春始終感恩。總之，趙時春交遊兵部官員、邊疆統帥，也是他性格和思想的旨趣所在。

與趙時春交往的還有許多學人。這些人中，如唐順之、王慎中、李開先爲著名文人，羅洪先、鄒守益、錢德洪爲理學家，王崇慶、陸燦、薛應旂爲當時有名學者，這也能從側面說明趙時春的學術成就、文學創作，正是時代文化熏陶的結果。

趙時春交往的陝籍人物值得注意。他們是：彭澤、康海、呂經、何棟、許宗魯、呂顥、胡侍、呂頤、李宗樞、閻溥、張治道、傅學禮以及靈寶（今屬河南，古屬陝州）的許氏父子。陝籍士人在明代中期是一個比較醒目的羣體，他們中有康海、呂柟等名震天下的狀元，有李夢陽、王廷相、胡纘宗、趙時春等著名文人，還有重臣彭澤及官宦世家靈寶許氏。許氏一門四尚書，位望顯赫，趙時春第二次被起用，就是許讚薦舉的結果，所以他詩文中流露出對許氏父子及其家世的熱情贊譽。

有意思的是，康海看不起趙時春。清代儲大文曾記載了許多文人間“娟嫉”的事例，關於明代的有“李東陽之於李夢陽，康海、王九思、朱曰藩、張孚敬之於趙時春、王慎中，夏言之於黃佐，霍輅之於任瀚，嚴嵩之於趙貞吉，王世貞、吳國倫、徐階之於茅坤，申時行之於湯顯祖”^[19]等，其中包含了康海看不起趙時春的事實。今趙集中有詩《寄康對山太史》一首、文《康太史集序》一篇，康海集中有《明故霑化縣儒學教諭趙公墓誌銘》一

篇，是康海為趙時春父親作的墓誌銘，但這祇是表面現象，或者是康海無法推託的情況下所作，在骨子裏面，康海看不起趙時春。今天看來，二人均為當時陝籍著名文人，趙時春也確實有着讓康海刮目相看的才華，可遺憾的是，他們畢竟沒有上演陝籍英才相互提攜、連袂馳騁的一幕。

以上是對趙時春交遊的簡單分析，側重於士大夫階層，其他如地方官吏、士子以及平涼韓王府的宗室，趙時春交往也多，因其不具代表性，故不再贅言。總體來看，這些交遊足以說明趙時春是那個時代正直士大夫中的一員；在明代中後期靡弱不振的士風下，他特立獨行，堅持儒學，直言敢諫，積極奮進，這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徐階所言，當時“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馳，虜日以驕”，趙時春的行為正可看成是對這種士風的矯正，“於時必有所補益”^[20]。他完全生活在時代的主流之中。

五、趙時春的思想

趙時春的思想偏於保守，以儒家的“三不朽”為基本座標，重視經邦濟世，同時又受宋明理學尤其是陽明後學的影響，具有明顯的理學氣息。

（一）“三不朽”的價值座標

趙時春立功的思想十分濃重，但他從來不明說自己是為功名而仕，而是標榜自己“馳心於聖賢君子之事”，說：“恥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利者，功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義之士所羞也。”^[21]這似乎是說，他在價值選擇上首選道義，其次才是功名。事實上，趙時春癡心於功名，他所獲得的功名，如嘉靖五年會元的榮譽、封疆大吏的身份，都在文章中屢屢提及；他罷官居